



海
峡
文
丛
「方彦富 主编」
H A I X I A
W E N C O N G



当代 文论嬗变

刘小新 著



江
苏
大
学
出
版
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HAIXIA WENCONG

海 峡 文 丛

方彦富 主编

DANGDAI
WENLUN SHANBIAN

当代 文论嬗变

刘小新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 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论嬗变 / 刘小新著. —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 9

(海峡文丛)

ISBN 978-7-5684-0048-0

I. ①当… II. ①刘…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7420 号

当代文论嬗变

Dangdai Wenlun Shanbian

丛书策划/芮月英

丛书主编/方彦富

著 者/刘小新

责任编辑/马一萍 米小鸽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14. 625

字 数/47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048-0

定 价/45.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目 录

20 世纪中国文论主体性的形成与演变	/ 001
审美直觉说的历史命运	/ 015
典律递嬗: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	/ 032
“文化工业”概念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	/ 045
“话语权力”与当代文论转向	/ 061
当代文论底层话语的兴起及其意义	/ 069
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失语”命题	/ 080
多元文化主义与“少数话语”	/ 093
文学与意识形态:从经典论述到当代	/ 109
文学的民族性与民族主义	/ 121
文学地理学:从决定论到批判的地域主义	/ 138
文学研究的意义与问题	/ 149
后现代知识语境与当代文论宽容思想重构	/ 170
文学研究的性别维度	/ 187

谈文学与宗教之关系	/ 202
阿多诺与黑格尔文艺思想比较论	/ 221
阿多诺与康德美学之关系	/ 233
阿多诺与浪漫主义	/ 244
现代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253
文艺学的空间转向	/ 271
身体、审丑与深度	/ 276
媚俗与崇高	/ 290
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文学	/ 300
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	/ 311
“闽派文论”的现状与再出发	/ 319
复杂性阐释策略	/ 332
《艺术感觉论》与新时期文论的转型	/ 338
台湾后殖民论述的诸种分歧	/ 348
传统思想资源与当代台湾知识界的和解论述	/ 370
当代台湾文论的“后学”论争与话语转换	/ 394
《岛屿边缘》与台湾“后现代左翼”的兴起	/ 410
后马克思主义在台湾的兴起(1987—1992)	/ 425
1945 年以降闽台佛教文化交流述略	/ 438
2013 年闽台文化交流述评	/ 452

20 世纪中国文论主体性的形成与演变

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抒情诗传统,但却没有产生在意义上与客体相分的“主体”概念,这个现象耐人寻味。叶维廉对中西诗学的比较阐释或许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答案。他说“落花人独立 微雨燕双飞”如果读成“有人独立在落花里,有燕子双飞在微雨中”,意味将丧失殆尽。因为古诗中景物自现,而在白话文的解读或英译中,人的主观性入侵干扰了景物的客观性与独立性。^①从儒家的“克己”到道家的“心斋”,从道家的“坐忘丧我”到佛禅的“破我执”,中国古典抒情诗的美感经验建立在主体虚位、“以物观物”的哲学基础上。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与西方近代主客相分的哲学传统有明显的差别,但历史地看,问题显然要复杂一些。正如张世英所说:“中国哲学史是从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到转向主客二分的发展史,明清之际是转折点;西方哲学史是从古希腊的主客不分到主客二分为主导原则又到现当代反对主客二分的发展史。”^②一方面,明清之际主体意识已经萌生。从心学对理学的反动到公安三袁的自适性灵,从汤显祖的以情为本到李贽的“人本自治”,文学的“主体意识”继魏晋之后又获得了一次张扬。毋庸置疑,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学理念,在现代文学的主体性建构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性的主体概念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一翼,它在近现代时期进

① [美]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9页。

② 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2页。

入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国文论的一个关键词。从20世纪初的导入到五四新文学时期的高潮,从50年代的大衰退到80年代的再崛起,“主体”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

一、主体概念的引入

“主体”一词在中国近代并不常见,较早使用该词的可能是梁启超和章太炎。梁启超论国家时曾有“国家为主体,人民为客体”之说,章太炎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国家之为主体,徒有名言,初无实际……或曰:国家自有制度法律,人民虽时时代谢,制度法律,则不得以代谢。即此是实,故名主体。此亦不然,制度法律,自有变更,非必遵循旧则。”^①从章、梁的争论可以看出,主体概念最初是作为政治思想领域的术语进入中国的,其背景显然是近代的民主化思潮。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越来越知道师夷长技以救亡图存的重要性,而且也认识到改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人们开始广泛介绍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民主思想,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最早介绍并推崇西方的民主议会制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传教士大量编译西方政治类图书(著名的如《万国公法》等),推销西方的议会制度和民主思想。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说与“社会契约”论传进了中国。到1887年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时,“民主”和“民权”概念也开始从日本转口输入。如果说魏源的“人者,天地之仁也”还是对传统的民重君轻思想的发扬,那么戊戌变法后,何启、胡礼垣的《劝学篇书后》则第一次深刻阐述了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触及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概念。自由被理解为个体的“自主之权”:“今人独在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则其人之权自若,无庸名以自主之权矣。唯出而与人遇,参一己于群侪之中,而自主之权以出。是自主者由众主而得名者也。”“人人皆欲为利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须有利益于众人,否则亦须无损害于众人,苟

^①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9页。

如是,则为人人之所悦而畀之以自主之权也。”^①这里关于“自主”与“众主”关系的辩证,已经触及了个体主体性与集体主体性的关系问题,直接开启了从章太炎到鲁迅的个体主体性思想,近代意义的“主体”概念呼之欲出。

章太炎早期思想倾向于唯物论和进化论,认为“以太”是万物的基质,进化乃宇宙与人性的自然律则,但他同时意识到历史发展的某种主观性:进化也是有意识的“以思自造”的过程。章太炎的后期思想融摄老庄佛学,认同“见量感觉,一切惟心”,发展出“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的个体主体性思想。与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倡“国家为主体,人民为客体”的集体主体性有所分别,章太炎把个人放在第一位。在他看来,国家为虚,个人为实,“个体为真,团体为幻”,极力张扬个体的自由、权利和个性解放精神。但我们在讨论章太炎的主体观念时,应该充分注意其言说的具体语境。一方面,群体或国家可能对个体主体性产生某种压抑。封建性的群体或国家尤甚,它严厉地控制了个人,从而导致个体的异化。在这一语境里,章太炎反国家主体论,而极力倡导个体主体。另一方面,当民族国家遭到异族尤其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时,章太炎又不遗余力地倡导民族国家的主体精神。汪晖曾指出:章太炎“用个体/国家的二元对立的论述模式来讨论个体与国家的否定性关系”。^②这种对立论述模式显然具有排满反封建的意义。然而,章太炎并非一味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对抗,“独”与“群”、个体主体性与民族国家主体性之间还存在着统一的关系,这就是他所说的“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的含义。汪晖视章太炎的个人主体性思想为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村落思想、宗法思想的激烈否定,这并不准确,至少不完整。章太炎的确把村落思想、宗法思想看作一种“小群”予以否定,但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在章太炎的思想体系里,“个体”与“种性”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以宗教发起信心”

①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

② 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1页。

与“用国粹激励种性”具有同样的意义。真正的“独”是通向“大群”的，个性解放与民族的救亡图存是一体的两面，“自利性与社会性，形式则殊，究极则一。离社会性即无自利，离自利即无社会性”。^①章太炎的个体主体性及其与国家、民族、社会性的矛盾辩证，对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思潮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在鲁迅和周作人那里表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近代思想是在与西方强势文化的遭遇中曲折展开的：从对先进技术的崇尚到对中西政治体制的比较，从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引进与争论到民族精神的启蒙与激励，近代思想最终走向个体与民族“主体性”的建构。这就是“主体”概念进入并在近代中国孕育成型的历史语境。梁启超说：“欲新一国，必先新一国之民，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鲁迅则认为，文艺可以“移人性情，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②近代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感性的文学在思想启蒙中具有比学说更重要、更特殊的作用，这正是梁启超、鲁迅等人如此重视文学的原因。因此，“主体”概念必然从政治思想领域向文学领域转移、扩散，并在文学现代性建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逐渐衍变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关键词语。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人们开始把“主体”概念引入文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重新阐发古代文论的“境界”范畴，赋予了传统概念近代的意义。这种近代色彩集中体现为主体精神的渗透。“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③一静一动，一优美一壮美，前者显然是天人合一的古典静穆境界，后者则具有近代主体论意味，优美与壮美的区分明显袭用了博克和康德的美学思想。从“主体”的虚位到“我”的出场与凸现，王国维的诗学预示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向。这个“我”在章太炎、鲁迅那里则被表述为“个人”，

①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203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③ 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91页。

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从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中获取思想资源,进一步阐扬了章太炎的个体主体性理念。其主体思想包括如下层次:第一,一为“非物质而重个人”。反对物质主义导致的人的异化,张扬人的价值。第二,重个人而反庸众。在鲁迅看来,启蒙主义的平等观念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然而,它也造成“个人殊特之性”的灭绝,“全体以沦于凡庸”,所以鲁迅个人“主我扬己而尊天才”。^①个体主体与群体之间显然存在对立关系。第三,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鲁迅认为主观尤尊于客观,主张以主观精神为真理的最高衡量准则。第四,鲁迅的个体主体论与章太炎相同,并没有把它与国族性对立起来,他主张“人立而后凡事举”,即人立之后才能立人国。因此,在鲁迅那里,个体主体性的张扬最终通向民族国家的复兴。20 世纪初,经过王国维和鲁迅的初步阐扬,主体概念逐渐从政治思想领域进入文学与文化论述中,并在启蒙文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主体性思想的形成

五四时期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时期,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个体主体意识高涨。章太炎在 20 世纪初阐释的“个人”概念逐渐演化成波澜壮阔的个性主义思潮。鲁迅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中,更明确地反对“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而倡导“个人的自大”,公开向庸众宣战,从而把《文化偏至论》的不无偏颇的个体主体性推向极端。这与胡适的“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周作人的“个人本位主义”,以及陈独秀的“个人主义之大精神”等,汇成个体主体性的思想主潮。所谓个人主义,陈独秀从哲学、心理学和法律三个层面阐释:“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第 51 页。

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现力也。”^①陈独秀的概括代表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理念：个人主义以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的实现为旨归。

五四时期的主体性思想同样包括个体与群体两个层面，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构成主体概念的完整内涵。在鲁迅身上表现为尼采与托尔斯泰的矛盾统一：一方面，鲁迅汲取了尼采的超人思想，把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推向极端；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托尔斯泰式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与旧文学有两个本质上的差异：其一，旧文学是违反人性的“非人的文学”，新文学则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他所说的“人”具有灵肉合一的特质，既有动物的一面，又有高于动物的另一面；他所谓的人道主义也不是悲天悯人的情怀，“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②因此周作人“人的文学”表达的显然是一种个体主体性思想。其二，旧文学是贵族的文学，“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③，而新文学则是平民的文学，它是表现一律平等的人类和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的文学，具有普遍性和真挚性。这里个体的主体性与类的主体性是统一的，这自然只是一种理想。“平民文学”和“个性主义”在当时都是被人们普遍推崇的文学理念，刘半农、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都主张用平民的文学取代贵族的文学，这已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文学“非致力于下等社会之实况之描写不可”。这一文学理念在“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构成人的主体性或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层面。而“个性主义”的文学主体性则在“创造社”的艺术实践中发扬光大。第一，“为艺术而艺术”确立了文学的自律性，使文学从载道工具的

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吴晓明编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②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第2集，张明高，范桥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24页。

③ 同②。

他律中解放出来,返回自身。第二,“自我表现”论确立了作家的主体性。“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摹仿的。”^①“艺术既是人生内部深藏着的艺术冲动,即创造欲的产物,那么,当然把这内部的要求表现得最完全最真切的时候价值为最高。”^②这种自我表现的主观性原则是大多数作家所普遍认同的,它构成了五四时期文学主体思想的高峰。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五四”“人的解放”思潮的合乎逻辑的历史转折。个体的主体性让位给阶级的、大众的 and 民族的解放,抽象的主体概念获得了具体的内涵。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而非从个人的层面理解自我或主体概念。乔纳森·卡勒曾经辩证地指出主体概念的主动与被动的两面:主体既是一种能动作用,一个自由的主观意志,但一个主体同时也是被决定的一个服从体,“要做主体就是要做各种制度的服从体”。^③在这一意义上,从抽象的主体到具体的社会的主体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个人主义的主体概念在民族救亡与阶级解放的语境里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也不可能成为具有主导性的文学理念。然而,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个体主体性和文学自律性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仍然存在。这种声音在以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里以“性灵”概念表现出来,它显然是明清之际性灵文学思潮与近代西方个性主义思想的一次综合;主体概念也在胡适派文人的自由主义文论中存活下来。从《语丝》的“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到《论语》的幽默,从《人间世》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到《宇宙风》的“文学亦有不必做政治的丫环之时”,以及朱光潜、沈从文等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个体主体性与文学自律的观念以各种微弱的声音不合时宜地表现出来。在文学因特殊的历史际遇而日渐

① 郭沫若:《文学的本质》,《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5 年,第 45 页。

②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 6 卷,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 年,第 99 页。

③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15 页。

他律化时,他们的声音形成了一种柔韧的制衡力量。

三、主体论的挫折与复兴

20世纪40年代朱光潜仍然坚守着其早期的直觉说:审美主体的完全自律与自由地观照形象,从而达到主客相契、物我合一的境界。他还把“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的主体论美学发展为一种自由主义的主体性:“我在文艺的领域维护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文艺的本质就是自由,而所谓文艺的自由“就是自主,就创造底活动说,就是自由生发”。^①因此,他反对他律的文学观,反对“凭文艺以外的力量奴使文艺”。不管这种力量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还是政治的。然而,在40年代中后期,朱光潜的直觉美学和自由主义观念遭到周扬和蔡仪的唯物论“新美学”的激烈反抗,也遭到胡风现实主义崇高美学的批判。这预示着“主体”概念大溃退的开始。

胡风既与自由主义的主体论为敌,又与客观主义作战。他用崇高的主体取代朱光潜静穆的主体和林语堂的“性灵”与幽默,用介入现实的主观战斗精神取代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体性,从而创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主体论。胡风指出:“主观公式主义是从脱离了现实而来的,因而歪曲了现实。或者飘浮在没有深入历史内容的自我陶醉的‘热情’里面;或者不能透过政治现象去把握历史内容……客观主义是从对于现实底局部性和表面性的屈服,或飘浮在那上面而来的,因而使现实虚伪化了,也就是在另一种形式上歪曲了现实。”^②显然,在胡风看来,纯客观的反映论与纯主观的主体论在把握人生和社会真实上都是成问题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主体论与反映论的合作即主观拥抱客观,人们才能创造出真实的艺术世界。当胡风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主体论被批判、被否定时,当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呼吁也被拒绝时,作为启蒙文学核

① 朱光潜:《朱光潜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54页。

② 胡风:《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98页。

心范畴的主体概念遭到巨大的挫折,甚至完全退出了五六十年代的文论领域。

80 年代,当代文学进入了新时期。哲学领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文学界“主体性”论战共同构成了一次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79 年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修订再版及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的出版,首先引起了美学和文论界对主体性概念的浓厚兴趣。“主体”一词重返文论的概念家族,再次成为文学新思潮的关键词语。历史地看,80 年代初的主体性思想资源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康德的主体性哲学;二是早期马克思的人学;三是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主观性自我表现理论。

与 20 世纪初相似,人们再次从康德那里获取思想的悟性。李泽厚首先阐述了康德哲学中丰富的主体性内涵:“如果说,黑格尔展示的是人类主体性的客观现实斗争;那么,康德抓住的则是人类主体性的主观心理建构。今天要为共产主义新人的塑造提供哲学考虑,自觉地研究人类主体自身建构就成为必要条件。”^①如果把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与其 1981 年发表的论文《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结合起来分析,那么,他对康德主体性思想的诠释与阐扬就十分清晰了。在他看来,这种主体性包括三个层面:认识论的、伦理学的和美学的。认识论上,康德划出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同时也标举人的认识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突出地表现在其对“自我意识”的阐发上。所谓“自我意识”即“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康德在“主观演绎”中强调了主体的直观、想象和概念的三种综合作用,它是知识所以可能的主观心理前提。但康德并未陷入完全的心理主义之中,他的“客观演绎”则突出了“客观秩序和统一性”是知识普遍有效性的根源。李泽厚指出了康德对认识的客观性和主体性关系的理解存在巨大的矛盾:自我意识不能脱离对

①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57 页。

象意识,而对象意识又是由自我意识所建立的。^①然而正是这一矛盾更彰显出康德认识论的主体性色彩。在伦理学上,康德也突出了主体性问题,“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这显然是一种以群体为中心的价值主体性,而审美活动更显现出“人的真正的自由感受”,最完满地展现人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李泽厚试图衔接从康德、席勒到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脉络,并尝试以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思想来诠释康德的主体观。在他看来,马克思“自然的人化”似乎是康德“自然向人的生成”朝辩证唯物主义方向的转化。对这一线索的凸现与回避黑格尔脉络是一体的两面,李泽厚明显意识到,黑格尔宏大的理性逻辑体系和对客观历史力量的推崇有可能淹没人的感性主体性。而从康德、席勒到马克思,人的感性一直被确认,并且从抽象的感性上升为具体的感性。李泽厚的主体性还强调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个体与人类群体的统一、自然与人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性后来引起了刘晓波的激烈反对。在与李泽厚的争论中,刘晓波走向一种与自然、社会及传统对立的极端的个体主体性:“人之为人的本能就决定了‘人类中心论’的不可毁灭。人,只要存在,就必然以自我为中心。”^②在90年代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中,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体观念则被人们彻底地抛弃了。

80年代初,人们更多地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获取主体性思想资源,就连李泽厚对康德主体思想的阐扬也明显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与启发。人们对这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产生了热烈的争论:它是否代表了马克思成熟的美学观点?异化劳动是否也创造了美?自然美是否属于社会范畴?美的规律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然而,今天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当代文论产生深刻影响的不仅是“异化”概念和人的主体性思想,它还打开了通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门。

①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4页。

② 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6页。

“异化”概念为人们解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可靠而有效的理论工具；而人的主体性思想，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及对人的感性存在的确立等观点则成为 80 年代美学的理论基石和核心命题。马克思指出：“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因为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①人们频频地援引这段话，似乎整个 80 年代的美学都在读解这段著名的论述。人们因此豁然开朗：美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在对象化中人感性地显现并确证其属于人的类本质。于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的、实践的主体性成为 80 年代美学和文论最激动人心的话语。文学、美学、心理学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处于整个人文社会的中心地位，也正是由于其对人性的关注和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

当然，这种主体性的确认并非易事。在那场关于朦胧诗的激烈争论中，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主体性就遭遇到僵硬的审美常规和反映论文论的强烈抵制。庞德说过，诗歌是种族的触角，它常常最早、最敏感地预见社会的某种变迁。70 年代末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折，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最初就在白洋淀的新诗潮里隐蔽地表现出来。新诗潮充分体现了先觉者对自我感觉的信任，而个人化的感觉和言语方式的复活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回归与复兴。然而，审美领域既是最活跃、最敏感的感性地带，也是最保守、最容易钝化的领域。这注定了新诗潮在文坛的公开登陆将遭遇僵化审

^① [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79 页。

美成规的激烈反抗。当文论界把新诗潮所隐含的主体意识和美学革命讯息公布于世时,旧的审美意识形态更是群起而攻之。今天看来,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人的“新的美学原则”,以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主观性自我表现论总结了新诗潮的深刻意义。新诗潮和“三崛起”把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感性而尖锐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到8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能够清楚明白地认识并表达“文学主体性”思想,刘再复幸运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他的《性格组合论》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尽管“组合”一词有些机械,与“灵魂的深邃”相抵触。而他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成为80年代“文学主体性”思想一种通俗易懂、条理清晰的总结陈词:“文学主体包括三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即:(1)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2)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3)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①这种集大成的总结陈词意味着“主体性”已成为文论的主导话语,已经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同。人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种照顾周全的主体性所隐含的冲突,即如何同时达成作家、作品和接受者的主体性?饶有意味的是,刘再复没有将作品与作家、读者并置,而是以人物形象替代作品。这里显然存在不对称性,其意图十分明显:三者人的主体性意义上获得一种统一。但人物形象不能代替作品,众所周知,并非所有作品都有人物形象。那些没有人物作品的主体性在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的论述框架里就可能被遗漏了。这一替代一方面是其《性格组合论》思想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理论逻辑的不严密性。问题暴露得如此明显,表明刘再复有意回避作品主体性。他可能意识到了某种逻辑上的困难:从作家和读者角度看,作品显然都是客体,作品如何成为主体?或许换一种说法会更准确些,即作家中心、作品中心和读者中心。根据伊格尔顿的分析,现代文学理论经历了三大阶段: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绝对关心作品阶段;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阶段。而三

①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